

文德 文术 文变

——论叶适的文学思想

陈心浩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历史上人们对叶适的研究,一般把他当作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来看待,因而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在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上面。其实,叶适同时是南宋期间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一些文学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有很多闪光的地方。从文德、文术和文变这三个方面来阐述叶适的文学思想,可以对这一历史人物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叶适;文学思想;文德;文术;文变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2-0070-06

南宋中叶的叶适,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文学家。至于他的文学理论在他本人诸方面成就中算不得突出,与其他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家相比,也逊色得多。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下面两点因素的时候,就不能不对叶适的文论另眼相看了:

一是与“永嘉四灵”之关系。四灵的诗论流传下来的极少,仅二、三则而已,且又是他人转述。一般人都认为永嘉四灵“其学皆出于水心(叶适)”^[1],同时叶适的诗论也代表了四灵的主张。曾从学于叶适的吴子良便说:“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玠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2]²⁵⁶因此,叶适的诗论具有双重意义。而四灵诗派虽成就不及他人,但在当时影响颇大。

二是叶适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当时,不仅受叶适奖掖、鼓吹的永嘉四灵祖承晚唐,而且南宋许多诗人都在有意无意间学习晚唐。杨万里《读笠泽丛书》诗中说:“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3]可见其对晚唐诗之倾心了。其余陆游、范成大、姜夔等人也有类似的文学追求。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又说:“杨、陆两诗豪尚规村杭晚唐,刘后村、陈无咎、林润叟、戴石屏辈无论矣。”^[4]叶适以学者文人身份侧身其间,谈文讲艺,同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学思潮有着共同之处。

本文从文德、文术和文变这三个方面来阐述叶适的主要文学思想。

一、文 德

何为文德?按詹福瑞先生的意见,它跟当代文学理论中文学的本质属性最为相近^[5]。刘勰在

收稿日期:2007-10-09

基金项目:2006年度温州文化研究工程项目(wyk0646)

作者简介:陈心浩(1967-),男,浙江临海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小说和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开首即说：“文之为德也大矣。”^[6]刘勰认为：天有天文，地有地文，人有人文，这都是自然之道。所以人文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适应了人心的需要，顺应了自然之理。正是这种顺应了自然之道的心的需要，决定了文的性质：“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6]所以，文德即心之文。它有两大属性：言志与抒情的属性和郁然有彩的属性^[5]。

对文德的重视，是中国历代文人和文论家们的优良传统。作为南宋中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叶适也不例外。

首先，叶适从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出发，认为诗文必须有益教治。他在教导门人薛仲庚的《赠薛子长》文中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①这里的“统绪”，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叶适认为：读书和作文，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传道，也就是为政教服务的。在《跋刘克逊诗》中他又说：“孔子诲人，诗无庸自作，必取中于古，畏其志之流，不矩于教也。……水为沅、湘，不专以清，必达于海；玉为珪、璋，不专以好，必荐于郊庙。二君（指刘克逊与刘克庄）知此，别诗虽极工而教自行”。他认为：孔子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因此不需要自己亲自作诗。但他担心人们作诗不合于社会教化，因而选取古人那些有积极思想意义的诗歌编成《诗三百》。而刘克逊和刘克庄的诗“极工”，是因为他们的诗“矩于教也”。这种诗文必须有益于教治的观点，是与我国古代儒家“文必载道”的文学思想是相近的，这在当时南宋道学盛行的情况下，有其特殊的意义。程、朱等道学家认为“作文害道”。有学生问程颐：“作文害道否？”程颐回答说：“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另外，程颐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诗。”^[7]正因为道学家鄙视文艺，所以叶适说：“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并针对道学家所谓诗是“闲言语”而加以讥刺说：“云淡风轻、傍花随柳之趣，其与穿花蛺蝶、点水蜻蜓何以较重轻，而谓道在此不在彼乎？”这是说道学家程颢《春日偶成》的“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与杜甫《曲江对酒》的“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都是描写景物诗句，为什么你们道学家的诗就有“道”的存在，而杜甫的诗却是“闲言语”？

在这里，叶适明显地强调文学的言志性质。只不过他所阐发的志要比程、朱等理学家们所阐发的志要现实得多，也深刻得多。

其次，叶适主张文章“作必奇妙殊众”，应该“瑰宫精切，自然新美，使读之者如设芳醴珍肴，足饮厌饜而无醉饱之失也”。他欣赏永嘉“四灵”之炼字琢句，为“四灵”之一的徐照所写的《徐灵晖墓志铭》中称赞徐照的诗歌：“有计数百，斫思尤奇，皆横绝欵起，冰悬雪跨，使读者变蹕慄栗，肯首吟叹不自己；然无异话、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尔。”因此他编有《四灵诗选》，选诗五百篇，江湖陈起曾予以刊行，惜现已失佚。他又选取宋代文学家作品编成《播芳集》，现亦失传，唯《播芳集序》仍存于《水心集》中。他在序中强调作文之难说：“昔人谓‘苏明允（洵）不工于诗，欧阳永叔（修）不工于赋，曾子固（巩）短于韵语，黄鲁直（庭坚）短于散句，苏子瞻（轼）词如诗，秦少游（观）诗如词。’此数公者，皆以文字显名于世，而人犹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难也。”于是他将这些名家之作，“择其意题之高远，词藻之佳丽者而集之，名之曰《播

① 本文所引叶适《水心集》处均出自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版。

芳》，命工刊墨，以广其传”。叶适明显地意识到，作为文学，仅仅满足言志的属性是远远不够的，文学还必须具备郁然有彩和抒发情性的功能。叶适本人也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这一理论。因而宋人叶绍翁说：“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可谓集本朝文字之大成矣。”^①吴子良则认为“水心诗早已精严，晚尤高远，古调好为七言八句，语不多而味甚长，其间与少陵争衡者非一，而义理尤过之”^{[2]312}。所以，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叶适“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

总之，对于文学本质属性的规范，叶适是主张“德艺兼成”的。他既强调文学的言志功能，又不偏废文学的抒发情性和郁然有彩的属性，使这两者在审美的观照下达到完美的统一。这种辩证的“文德”观，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文 术

“术”是借用了《文心雕龙》的术语。刘勰认为：“文场笔苑，有术有门。”^{[6]390}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术”是指正确的文章体制和规格要求，以及文章的写作规律、原则和方法。本文所说的“文术”，主要是用其写作规律、原则和方法之意。

对于“文术”的阐述，叶适提出了著名的“三特”理论。在《答吴明辅书》中他说：“意特新，语特工，韵趣特高远，虽昔之妙令秀质，其终遂以名世者，不过若是，何止超越辈流而已哉！”通过意新、语工、韵高等三个方面来评价吴明辅的诗。

叶适在论诗时特别重视“意”，常以“意”为先。但他所说的“意”并非指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内容。从他的具体论述中可以发现，“意”所涉及的大多是人的识与才的问题。见识高远超迈，下笔才能“无俗间鄙腐意”（《竹洲戴君墓志铭》）。而诗意俗，乃诗家之大忌。那么，何者为俗，何者为不俗？叶适没有明白的阐述。不过他指出了两条达到不俗的蹊径：一是除俗必须布新。他称赞陈耆卿之“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题陈寿老文集后》），称赞刘潜夫写诗“思益新”（《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便是从立意或构思上来突出这个“新”字的。新，是叶适诗歌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范畴。为了新，有时不妨清，不妨奇，也不妨巧，也不妨险。而奇能生新，巧中多新，险中有新，互相之间都有一种微妙的连带关系。但无论是奇巧，抑或是奇险，都要有一个限度。所谓“险不流怪，巧不入浮”（《题陈寿老文集后》）者，便是这个意思。

“语工”即语言要简练生动，所谓“片语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从而达到“矜其华采”（《归愚翁文集序》）的地步。“必独出肺腑”的要求应该说是很高的，既自然隽永，又能深切地表达情感，所以叶适论诗特别注重诗语之工，如评杜甫《送扬六判官使西蕃诗》：“语出卓特，非常情可测。”（《松庐集序》）又如评四灵诗：“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徐灵渊墓志铭》）这和韩愈的“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古文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叶适的“语工”，不是就语言而论语言，而是要求文学的语言要为表述一定思想内容服务的，所谓“夫文者，言之衍也”（《周南仲文集序》），也就是说郁然有彩的文学语言，是为表达深邃而独到的思想内容服务的，离开了这一原则，就无所谓“语工”。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言止而不穷。”（《水心集》卷五）这虽是用来评述《诗经》的语言成就，实际上是对语言的审美功能的一种概括。又如他在《跋刘克逊诗》中所说：“趣味在言语之外。”这可以和严羽的“兴趣”说相互生发。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①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四，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版。

“韵高”指韵趣的高远。宋人尚韵，作为文论的范畴，如北宋范温在《潜溪诗眼》中就提出“有余意之谓韵”^[8]；黄庭坚也提出“凡书画当观韵”，“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9]。那么如何才能达到“韵高”呢？叶适在《沈子寿文集序》中曾说：“其不为奇险，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读之者如设芳醴珍肴，足饮饜食而无醉饱之失也；又能融释众疑，兼趋空寂，读者不惟醉饱而已；又当销愠忘忧，心舒意闲，而自以为有得于斯文也。”这里通过读者的审美感受，对“韵”的那种飘逸于形象之外的意蕴美，已揭示得极为充分了，同时表达了作者对审美的追求。在《答刘子至书》中，叶适曾将江淹的《田居》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加以比较，认为“江淹作渊明《田居》，语若类而意趣全非。”陶渊明那首诗人们很熟，不录。现只录江淹原诗如下：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中柴车，路暗光已夕。
归人望烟火，稚子檐下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
正如此，开经望三益。

江诗虽极力模仿陶诗，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虽有”二句已是勉强，“问君”二句有点莫名其妙，“素心”二句简直就是造作了。陶诗那种完全发自心底的愉悦之情没有了，那种和谐宁静的氛围没有了。江淹的《田居》和陶渊明的《归田园居》虽表面上有些类似，如“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等，但韵不高，缺乏陶渊明自然冲淡而闲适的“意趣”。而陶渊明的诗，恰恰是以“韵”取胜的，正象陈善《扞虱新语》所说的：“读渊明诗颇似枯淡，东坡晚年极好之，谓李杜不及也。此无他，韵而已。”^[10]他曾将欧阳修等人的文章编为《播芳集》，其选取的主要标准也是“择其意趣之高远”。

叶适的“三特”理论，概括了他的“文术”要求，正是他的文学思想最有价值和特色之所在。

三、文 变

文变的观念，先秦就已有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乐工为其歌《周南》、《召南》，季札定其为“始基之矣，犹未也”时诗，歌《邶》、《鄘》、《卫》，季札曰：“吾闻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歌《王》，曰：“其周之东乎？”歌《豳》，曰：“其周公之东乎？”歌《秦》，曰：“其周之旧乎？”歌《大雅》，曰：“其文王之德乎？”据乐而判断其所反映的时代和政治民风，其间就隐含着文因时变的意思。《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同样也反映了文因时变的观念。

汉人《毛诗序》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它认为诗乐与时代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同时代的不同政治，会产生不同的诗乐。《毛诗序》的论述，代表了汉儒的文变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变的呼声更加强烈。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云：“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文矣。”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里亦云：“推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6]272}这些观点都反映了文章因时而变的文学发展规律。

叶适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封建社会由强而衰的转型期，文学的风格也逐渐从外向而趋于内敛。叶适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风向标，深刻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变观念。

叶适的文变观念首先体现在尊古而不陋今的批评理念上。他尊古但不盲目地崇古，他总能根

据自己的理解对古人的作品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他所作的《习学记言序目》50卷,是他晚年潜心治学的结果,具有独立思考、独抒己见的精辟之论,正如他的门人孙之弘在《〈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序》中所说:“根抵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对“亚圣”孟轲的批判,指出孟子的偏失在于“以道为始”^{[11]583}的唯心主义观点,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禁区,要冒一定风险的。又如对庄子的评论:“嗟夫!庄周者,不得志于当世而放意于狂言,湛浊一世而思以寄之,是以至于此。其怨愤之切,所以异于屈原者鲜矣。”对于庄子的评论,正如明人陈治安说:“宋元人讥贬。”到了明清才出现将庄子与屈原并提的看法,如陈子龙在《潭子庄骚二学序》中说:“战国时楚有庄子、屈子,皆贤人也,而迹其所为绝相反。”^[12]所论乃以两人的“绝相反”为旨归。而叶适所论则通过深刻的历史联系,说明两人都是怀着深挚的“怨愤”之情,可谓真知灼见。又说:“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四焉:好文者咨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遗其累,奸邪者咨其欲。”这段话曾被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征引,说明它对后世产生的广泛而巨大的文化影响。

叶适既反对“古今异时”而割断历史的错误,又反对当时越来越盛的复古、崇古风气。他说:“后世诗文选集:《诗》通为一家,陶潜、杜甫、李白、韦应物、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各自为家,唐诗通为一家,黄庭坚及江西诗通为一家。人或自谓知古诗而不能知后世诗,或自谓知后世诗而不能知古诗。及其皆知,而辞之所至皆不类,则皆非也。”认为魏、晋、唐、宋的诗派都是承继《诗经》而来,但又“各自为家”而具有时代社会嬗递的轨迹和特色;突出其承前启后的承继关系,并且将欧阳修等宋代诗人与陶、杜、李并列,足见对宋诗其中包括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肯定。至于唐诗与宋诗的优劣问题,那要通过具体客观的辨析,其《王木叔诗序》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所引虽是王木叔之语,无疑也是叶适自己的观点,以此来界定唐诗的特点,应该说是相当深刻而富有理论意义的。所以他反对“尊古而陋今”,并以韩愈《送孟东野序》为例批评道:“韩愈盛称皋、夔、伊、周、孔子之鸣,其卒归之于《诗》,《诗》之道固大矣,虽以圣贤当之未为失。然遂谓‘魏晋以来无善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乱杂而无章’,则尊古而陋今太过。”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尊古而不陋今呢?叶适认为必须从“事功”的思想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学之兴,萌芽于柳开、穆修,而欧阳修最有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继之,始大振。”^{[11]696}又如评苏轼诗:“哀而不伤,放而无怨,高于古人数等。”并屡屡称扬刘克庄、永嘉四灵的诗,就是明显的例证。但对于谬误的观点,如周必大为吕祖谦奉旨所编《皇朝文鉴》写的《序》,则明确指出周《序》所说“熙宁、元祐之辞达”不符合实际,因为王安石“废赋而用经”于前,二程“发明道学”继后,二者都使文字败坏,有什么“辞达”之可言?因而对熙宁、元祐的文章是不能笼统地加以肯定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事物的认识必须通过亲身实践和全面考察,“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题姚令威西溪集》)。否则“论高而实违,是又不可也”(《水心集·进卷·总义》)。这正是事功思想在认识论中的体现,可谓独具卓见,自成一家之言。

其次,叶适的文变思想还表现在力求创新上。吴子良《林下偶读》卷三曾记述叶适和他的门人陈耆卿讨论文章写作的故事:“水心与笱窗(陈耆卿之号)论文至夜半,……因问笱窗某文如何?时案上置牡丹数瓶,笱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种,先生能数十百种,盖极文章之变者。’水心曰:‘此安敢当,但譬之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自家罗列,仅

磁缶瓦杯, 然却是自家物色。’水心盖谓不蹈袭前人耳。磁瓦虽谦辞, 不蹈袭则实话也。”这里叶适是说作文必须是独立创作, 即使别人家作品是金银器皿, 倒不如自家的磁杯瓦盏可贵。

总之, 叶适提出的“德艺兼成”的辩证的文德观, 他的著名的“三特”理论, 以及尊古而不陋今、要求创新的文变观念, 是宋代进步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性质和功能。

参考文献

- [1] 朱东润.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7: 145.
- [2] 吴子良. 林下偶谈: 卷四 四灵诗[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67.
- [3] 刘克庄. 后村大全集: 卷十六[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1681.
- [4] 钱钟书. 谈艺录: 上卷[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24-125.
- [5] 詹福瑞.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7.
- [6]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7] 程颐. 程氏遗书: 卷十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669.
- [8] 范温. 潜溪诗眼[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512.
- [9] 黄庭坚. 豫章黄先生文集: 卷二十八[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636.
- [10] 陈善. 扞虱新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168.
- [11] 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2] 陈子龙. 湘真阁稿[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352.

Virtue, Rules and Transform of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 On Ye Shi's Literature Thoughts

CHEN Xinhao

(Humanity Colleg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When studying Ye Shi, we alway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his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 thoughts and took him as a politician and thinker in the history. Actually Ye Shi was an important author and critic, in south song dynasty. Some of his literature thoughts have many value places, not only in the past but also in the pres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ants to explain the three aspects of virtue, rules and transform of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of literature thoughts of Ye Shi, in order to have an overall view to this historical figure.

Key words: Ye Shi; Literature thought; Virtue of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Rules of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Transform of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编辑: 杨峰)